

论林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及其文化意义

李伟昉

内容提要 林纾翻译的《吟边燕语》，是中国以完整的戏剧形式并用白话文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前最重要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翻译，对推动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林纾把莎士比亚理解为一个“好言神怪”的传奇诗人，这种理解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是误读。其实，林纾对莎士比亚的这种解读有其明确指向性，旨在借莎士比亚的传奇身份表达对国内一些维新之士为学西方而否定自身传统倾向的不满，认为任何求新与发展不能以丢弃自身文化传统为前提和代价，守护文化传统应该是中西方国家赖以发展、共同遵从的规律，从而彰显其坚守传统文化的立场。

在跨文化阅读与接受中，理解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来自异域的作家作品的面貌、形态及其意义。一般而言，读者总是沿着某个特定的价值方向理解作家作品的，这种理解与社会现实语境、历史文化积淀相联系。换言之，接受者在接受外来文学时，总是基于自身阅读经验、阅读习惯以及主客观需要去积极主动地挖掘那些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从而为我所用。因此，作家作品在被解读过程中出现一些变异现象，正是文化过滤的结果，也是阅读本身的客观规律。就艺术的形象文本而言，任何读者的阅读都存在误读的可能。因为文本一经产生便成为客观存在，其自身意蕴的开放性和多义性特征，使读者难以把握其全部意义，他只能从某些角度不断地接近文本，而无法完全契合文本。即使是创造文本的作家，他对已经出版发行进入公共领域的自己的文本，也只能拥有一家之言，并不一定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就读者而言，他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自信是真实的、有效的，只存在阅读感受的不断补充和深入。

晚清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从志怪传奇层面翻译《吟边燕语》、解读莎士比亚，就是跨文化接受的一个典型案例。

—

1904年，不懂外语的林纾在魏易的口述下，

用文言文翻译了《吟边燕语》。在这一翻译过程中，莎士比亚被林纾理解为一个志怪传奇诗人。他不仅在译本序言中是这么界定的，而且在具体翻译中，他对每个篇名的翻译用词以及对神怪离奇氛围的渲染上，无不着力强调突出着莎士比亚志怪传奇的创作特征。但是，这种理解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是误读。那么，林纾是否误读了莎士比亚呢？让我们先看看《吟边燕语》的译序是怎么说的：

欧人之倾我国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维新之从。余谓从之诚是也，顾必谓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耳。英文家之哈葛得，诗家之莎士比（亚），非文明大国英特之士耶？顾吾尝译哈氏之书矣，禁蛇役鬼，累累而见。莎氏之诗，直抗吾国之杜甫；乃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西人而果文明，则宜焚弃禁绝，不令淆世知识。然证以吾之所闻，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弦户诵，而又不已；则付之梨园，用为院本；士女联袂而听，唏嘘感涕，竟无一斥为思想之旧，而怒其好言神怪者，又何以故？……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

故西人惟政教是务，瞻国利民，外侮不乘，始以余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虽哈氏、莎氏，思想之旧，神怪之托，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为病也。^①

林纾明确指出莎士比亚的创作“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是一个深受西方人喜爱的“好言神怪”的传奇诗人，其作品“直抗吾国之杜甫”。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实际上，林纾不是这一观点的发端者。这种认识至少应该得益于《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和《瀚外奇谭》的译者。1902年，《新民丛报》十四号上刊发新小说报社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其中提到了莎士比亚被作为传奇小说家为国人接受的事实。文内列举的小说类型中有“传奇体小说”，并指出：“本社员有深通此道、酷嗜此业一二人，欲继索士比亚、福禄特尔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②1903年，上海达文社首先用文言文翻译出版了题为英国索士比亚著的《瀚外奇谭》。翻译这本书的译者没有署名，所以译者身份不详，但从“瀚外奇谭”的译名看，译者显然是把莎士比亚作为海外一位擅长构思奇谭故事的作家来看待的^③。林纾把莎士比亚视为传奇诗人，同样有着鲜明的现实考量和政治动机。把握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林纾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欧洲人将中国的沦落衰败归因于见识短浅，思想古旧，喜古薄今，好言神怪。就是说，西方人认为一个国家的落后衰败与思想古旧、好言神怪等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让林纾疑惑不解。因为在翻译哈葛得、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他敏锐地发现，外国人针对中国的断言与西方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入颇大，西方人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按照西方人的逻辑，文明发达的他们应该将“思想之旧，神怪之托”的莎士比亚“焚弃禁绝，不令淆世知识”才对，但实际上却是对莎士比亚“坦然不以为病也”。相反，“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弦户诵，而又不已；则付之梨园，用为院本；士女联袂而听，唏嘘感涕，竟无一斥为思想之旧，而怒其好言神怪者”。可见，西方人并不认为思想古旧、好言神怪可以误国毁邦。既然西方并未因喜欢“思想之旧”、“好言神怪”而影响其进步、发达与文明，那为什么偏偏就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此呢？对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以及所

持有的双重价值标准，林纾颇所警觉，他意识到了西方人恃强凌弱的优越感和不由分说的霸道。他不能接受这种论调。在他看来，“思想之旧”、“好言神怪”与文化传统的层面有关，任何求新与发展不能以丢弃自身文化传统为前提和代价，守护文化传统应该是中西方国家赖以发展、共同遵从的规律。在这里，林纾提出了“新”与“旧”、“发展”与“继承”辩证关系的重要命题，也体现了他希望与西方平等对话的诉求。

不过，林纾并未到此止步，他还想进一步探究：既然西方人如此喜欢“思想之旧”、“好言神怪”，为什么就没有导致西方国家的落后衰败呢？他认为，政教发展与文学创作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隶属关系，政教发展好，会有益于文学，而文学再美也无助于政教发展。明乎此，西方人才特别注重发展政教，强国富民，然后在无外敌入侵之虞的情况下，方有闲暇以文学家的作品来爽心悦目，自得其乐。林纾的这一看法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主要想借此说明，国运衰败与政治教育、社会发展有关，与喜爱“思想之旧”、“好言神怪”的文学作品无涉。这证明西方人针对中国的观点站不住脚。至于“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之说，林纾本人其实也不认同，否则与他热心翻译《吟边燕语》等外来文学作品的初衷大相径庭。这一点容后再议。

值得注意的是，让林纾精神上受到莫大刺激的，不仅仅是西方人对我们的讥笑，而且更在于自己同胞的西化倾向。他不明白，西方人的观点明明不可信，为什么一些“一力求新”的维新之士，竟然也跟从“欧人”的观点诋毁自身传统，妄自菲薄呢？他不反对“维新之从”，但反对“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他反对西方人对我们的否定，更反对自我否定。在国门洞开、西风东渐之时，认为西方一切皆好的结果，只能是愈赞美、羡慕西方，也就愈加矮化、丑化自己。当时不少维新之士的这种接受心态，令林纾特别不能容忍。这种接受心态是有害的，带着这种心态学习西方，无法让自己充满自信，更难以使自己变得强大。因此，林纾异常清醒地反复告诫人们“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④，西方“虽文明者亦施我以野蛮之礼”，故“勤求新学”，只为“振作士气，爱国保种”^⑤。但是，不是外来的“新”都是

好的、先进的，也不是自身的“旧”都是坏的、落后的。林纾的“不必心醉西风”以及新与旧辩证关系的稳健观点，使他在稍后即将来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保持了不激进不偏颇的所谓保守态度，也让这位曾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做过奠基性突出贡献的“领军人物”，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绊脚石”和众矢之的。“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的一切文化业绩”^⑥。林纾的“保守”未能对“激进”产生制约作用，这不是他的过错，却是历史的遗憾。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林纾并非不倡导新文化和新文学，只是不赞成一刀切地反对旧文化和旧文学。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源远流长、自上而下接续而来的文化传统基因中，不乏许多精粹宝贵的东西，怎么能不加选择、不加辨别一股脑地否定掉呢？如果吸收、发展新的东西，就必须抛弃、否定过去旧的一切，那么新从何处来？这个民族还会有悠久文化传统可言吗？可见，后来学衡派提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观，或许也受到了林纾“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⑦观点的影响吧。

二

那么，让我们还是回到论文前面提出的问题上：林纾是否误读了莎士比亚？从林纾的角度看，不是误读。林纾选择《吟边燕语》来翻译，并把莎士比亚理解为“好言神怪”的传奇诗人，有其明确的为我所用、服务当下的意识，旨在借莎士比亚的传奇身份表达对当时国内一些维新之士为学西方而否定自身传统倾向的不满，从而彰显其坚守传统文化的立场。假如林纾对莎士比亚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传奇的层面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他真的误读了莎士比亚，或者至少说他对莎士比亚的认识是片面的。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把莎士比亚视为传奇诗人，虽然莎士比亚的作品具有明显的传奇色彩。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远远超越了传奇诗人的层面，所以他才说莎士比亚的作品“直抗吾国之杜甫”。请注意，林纾在这里拿杜甫与莎士比亚相比本身，就颇耐人寻味。为什么偏

偏把莎士比亚与作为“诗圣”的杜甫相比，而不是与作为“诗仙”的李白相比呢？说莎士比亚的作品“直抗吾国之李白”不是更恰如其分吗？以林纾这样的大家，绝不会犯如此比较不当的常识性错误。显然，林纾本能、敏锐而清醒地意识到了莎士比亚传奇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广的现实内涵及其意义，并且借莎士比亚传奇诗人的身份来张扬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观念。因此，他是有感而发，不是受猎奇新鲜、消愁解闷的驱使而翻译，而是借翻译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他感叹道：“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氏之诗。余今译莎诗记事，或不为吾国新学家之所屏乎？”^⑧既然先进、发达的西方人都这样坦然地喜欢莎士比亚，我们的维新之士们还有什么理由拒斥莎士比亚呢？林纾的言外之意，就是以翻译莎士比亚来试探“吾国新学家”的态度的。这一反问，亮出了林纾中西比较的问题意识与服务现实的价值立场。仅此一点，引人深思。

其实，作为中国传统文人，林纾深受文以载道思想的濡染。如前所述，若真的相信林纾的“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就无法解释他不遗余力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真实动机。梁启超曾说：“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⑨梁启超虽然对林纾的评论过于苛刻，颇不符合实情，但却明确认可林纾“因文见道”的倾向。这无疑是对的。我们仅从林纾翻译《吟边燕语》，就可感受到其让文学有益于政教的考量。结合具体语境看其“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不是说文学无用，它确有娱悦读者心目的功能，有教化读者思想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不该蓄意夸大文学的能量，更不会直接起到衰亡国家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政治经济。然而，文学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如果我们细品林纾其他译序，就能发现其爱国情愫、强国之志淋漓尽致地跃然纸上。例如，1901年，他在《〈译林〉序》中说：“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面对国难当头，他勇于担当，不无悲壮地直言：

“呜呼！今日神京不守，二圣西行，此吾曹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虽然，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燭，吾不能不然之。”^⑩1905年，他坦承翻译《鬼山狼侠传》的目的乃是“用以振作积弱之社会，颇足鼓动其死气”，相信“是书之仍有有益于今日之社会可也”。并且强调：“余前译《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自以为于社会至有益也。若是书奇譎不伦，大弗类于今日之社会，译之又似无益。不知世界中事，轻重恒相资为用。”^⑪1907年，他在《〈剑底鸳鸯〉序》更是明确指出：“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追蹶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⑫上述译序，鲜明地体现了林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自觉的担当意识。难怪他曾发自肺腑地慨叹：“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摭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⑬无疑，林纾是一个思想文化的启蒙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林纾“不仅是沟通中外的翻译家和卓有建树的评论家，也是对本国文化传统有着深刻反省意识的捍卫者”^⑭。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正因为林纾认为接受文学作品中的神怪描写并不与社会发展变革进程相矛盾，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本人即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当然，他坚决反对把神怪行为搬演进现实生活中，某种程度上，这解释了他为什么对“义和团”的一些做法极为反感了。他早期的《闽中新乐府》，就已表明了他对乡间迷信和传统陋习的批判立场。

三

梳理林纾对莎士比亚的独特接受，并联系他的其他译序，其丰富的思想内涵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首先，本土文化立场是我们思考的起点与终点。我们自身所处的文化立场是触发思想的源泉和根本，而思考是源于外在触发物的碰撞而作用于内在需要的结果。思考只有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时，才会有深度和意义。中国文学中自古就有

志怪传奇的传统，这一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雅士，诞生了众多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传世之作，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也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较为稳定的阅读欣赏习惯与审美趣味。作为传统中国文人的林纾，自然深受这一传统的熏陶。他对莎士比亚的个性化接受最能体现他的良苦用心。虽然他翻译的《吟边燕语》不是莎士比亚的原剧，而是查尔斯·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但这并不妨碍林纾对莎士比亚的基本审美判断。正是富有志怪传奇色彩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林纾的注意力，才使他自然而然地从这个角度进入到莎士比亚五光十色的戏剧王国，不断地从翻译中吸纳丰富的外来信息，感受异域世界的精彩，并自觉地去比较、去思考。尽管他的翻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还多为现代翻译家所诟病，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主动与本土化接受习惯接轨的努力仍然值得赞赏。与本土化阅读习惯衔接移入外来文化，是跨文化接受传播顺利进行的基础和前提。正是这一翻译策略，不仅让林纾取得了无可争辩的巨大成功，激发了后来成为大家的诸如郭沫若、钱锺书等一大批作家和学者对莎士比亚的热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文明意识，尤其是作为现代思想文化意识重要构成部分的个性意识或自我意识，随着他的《吟边燕语》等多种译本有效地传播了进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世界化进程，对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起到了最初的启蒙作用。同时，也正是林纾对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志怪传奇特征的敏锐感知，让他能迅速抓住中西皆“好言神怪”而结果迥异的这一关键性问题借题发挥，加以比较，从而有意识地对西方歧视中国人的相关言论和“吾国新学家”否定自身文化传统的倾向提出质疑，旗帜鲜明地对“新”与“旧”及其与文明、发展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表达了不盲从不媚外、坚守本土文化传统的态度。凡此种种，都使他的翻译承载了难得的厚度和品味，拥有了独特的魅力和张力。因此，翻译《吟边燕语》是林纾关注传统和现实的结果，倾注着他传统和现实的深入思考。

其次，林纾对外来作家作品的接受及其译序启示我们，对西学要保持健康的接受心态，正确

处理好借鉴西学与发展自己的关系。林纾坚守文化传统，却不抱残守缺，封闭自己。他说“欧人志在维新，非新不学”，“若吾辈酸腐，嗜古如命，终身又安知有新理耶？”^⑤但是在他看来，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不是融入西方，迷失自己，更不是放弃自己，而是为了丰富自己，强大自己。他一再提醒我们“恣肆于西学”，是“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唯此“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⑥。法国现代著名批评家朗松有一段话，与林纾所言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照原样复制外国思想”，“我们只是从中吸取为我们所用的东西。……我们是模仿他们的榜样而把‘我们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好。’”^⑦因此，“我们在此重申吸收外来文化文学为我所用的原则，也是针对弥漫在当下缺乏严肃思想和价值引导的接受倾向而发的。在消费文化盛行、喧嚣炒作普遍、价值迷失、思想缺席的语境里，学界对外来文学批评理论和作家作品的接受中缺乏必要的碰撞和争鸣，显得沉闷拘谨，没有活力。多元开放的时代不仅需要百花齐放，更需要百家争鸣。争鸣是观点的对峙，碰撞是思想的交锋。价值和意蕴总是在接受者不断地碰撞与争鸣中逐渐得以敞开和确立的”^⑧。

然而，应该清醒地看到，100年前困惑、干扰我们的一些问题，当下依然困惑、干扰着我们。特别是在借鉴西学与发展自己的关系问题上，总会出现一些认识的偏差与幼稚的盲从，以致失去正确的判断力。我们现在十分热衷于国际化、全球化，从根本上说，国际化、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的不同表述而已，骨子里的内涵还是西方中心。我们虽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意识，没有走出被西方影响的阴影。今天，我们正在由文化资源大国向着文化强国的“中国梦”迈进，这更需要我们重拾文化自信，强化文化身份认同，树立多元文化观。我们既要国际化、全球化，又需警惕掉入国际化、全球化的陷阱。或许，这正是我们今天重谈林纾的意义所在。

①⑧林纾：《〈吟边燕语〉序言》，第1页，第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下同。

③转引自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第127—12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④林纾：《〈块肉余生述〉前编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349页。

⑤林纾：《〈黑奴吁天录〉跋》，《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44页。

⑥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参见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3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⑦⑧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182页，第181—182页。

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参见《饮冰室合集》第34集，第7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⑩林纾：《〈译林〉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42页。

⑪林纾：《〈鬼山狼侠传〉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159—160页。

⑫林纾：《〈剑底鸳鸯〉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292页。

⑬林纾：《〈不如归〉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355页。

⑭陆建德：《海潮大声起木铎：再谈林纾的译述与渐进思想》，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第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⑮林纾：《〈斐洲烟水愁城录〉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158页。

⑯〔法〕朗松：《外国影响在法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参见朗松《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第8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⑰参见拙文《接受与变异：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超